

·关注·

穿行在延安市安塞区招安镇的深山沟壑之间，一处隐于深沟的古村闯入视野，这便是李塔村。村落依山坡窑洞而建，村前山岭之上，残存的古寨石墙历经风雨，静静伫立。

这片土地的故事，远比眼前景致厚重。唐代吐谷浑部族在此繁衍生息，宋夏对峙时烽烟四起，明代边患连年，乡民凭寨避险，及至晚清动荡岁月，古寨又一次成为百姓的庇护之所。千年以来，一座李塔寨，守护着全村人安稳度日，也沉淀下黄土高原地独有的历史记忆与生存智慧。

烽烟早已远去，古寨依旧无声。走进李塔村，循着残垣、碑刻与老屋遗存，我们一同品读这座深沟古村跨越千年的寨堡春秋。

黄土褶皱藏古寨 烽烟遗迹载春秋

——安塞李塔村记

于媛媛

李塔村藏在安塞区招安镇东北的一条深沟里。

从沟口往里走，山越来越紧，路越来越窄，正当你觉得前方再无人家时，眼前忽然豁然开朗：几十户人家的窑洞依山而建，一条小溪从沟里流出，村前一座陡峭的山岭上，残破的石墙隐约可见——那就是李塔寨。

这座寨子，当地人谁也说不出究竟建于何年。只知道“老辈子就有了”，每逢乱世，全村人就躲上去。寨墙三面皆是陡壁，唯东北角设门，易守难攻。寨内有井，有粮仓，是先民在动荡年代里用石头垒出的最后一道防线。

李塔村的历史，远不止这座古寨。明朝天启四年的墓石刻着“奕世文明”，清代院落的门楼上刻着“荆树有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耕”。而更深的土层下，还埋着唐时的吐谷浑牧蹄、宋夏的烽燧、明代套虏的

寨等，共同构成了安塞北、西方向的扇形军事防御纵深。安塞区在军事地理上的定位，古人早有定论：“金明屏蔽，上郡扼塞”——安塞是延安的北面屏障，军事上的险要关隘。李塔村就深藏在这样一条“扼塞”地带的支沟之中，虽远离主河谷，却从未真正远离过这条河谷所承载的战乱与动荡。

从更长远的历史脉络看，这片土地的人文底蕴比宋明时期更为深厚。据《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等史料记载，唐高宗仪凤年间，朝廷将自青海、甘肃一带内附的吐谷浑部落安置于延州（今延安）之境，特置“浑州”以统辖，其地大致在延州西北，涵盖今安塞西部、志丹东部一带。杏子河的古称浑州川正源于此。吐谷浑人在这片河谷地带“随逐水草，习骑射，事畜牧”，生活了数百年之久，与当地汉人、党项等族逐渐交融。尽管“李塔”之名源自明清时期

且三面绝壁、易守难攻，具有典型的防御地形特征。结合当时宋夏在这一带“堡寨相望，烽燧相接”的防御格局，可以合理推测：李塔寨所在位置，极有可能是北宋招安寨防御体系向杏子河支沟延伸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承担着前哨预警、扼守支沟、保护粮秣及乡民临时避难等辅助性功能。其寨中必有古井，正是宋代堡寨“因山为寨，必先择有水之地”这一生存原则的体现。虽因规模所限未载于《宋史》等正史，但它应是民间自发或官方督指导下修建的次级防御工事，是“官防”与“民守”结合的产物，见证了宋夏百年对峙的边疆常态。从建筑层累看，现存寨墙、门楼多为明清甚至近代为防土匪而重修加固，但其核心选址与基本功能，很可能在北宋时期即已奠定。

寨子三面皆是陡峭沟壁，唯东北角设寨门，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在那个官府力量难以抵达的岁月里，这座古寨就是村民们赖以自保的屏障。每逢战乱匪患来袭，全村男女老少便携粮带水，攀援而上，藏身其间。从其战术作用推测，这样的地形尤其利于防御自沟口而来的小股游骑袭扰。在宋夏时期，它可能主要应对西夏的“打草谷”小队；在明清以降，则用于抵御流寇与土匪。石门楼上“荆树有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耕”的对联，恰是这种“战时据险以自保，平时耕读以求存”的双重生活理想的深刻写照。李塔寨无声地提醒着后来者：在漫长的农耕岁月里，安宁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馈赠，而是每一代人用石头与胆量换来的守护。

李塔村的民居窑洞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院落之间以石径相连，雨天泥泞难行，晴日里倒也曲径通幽。窑洞深处，冬暖夏凉，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李塔人都在这里出生、长大、老去，在黄土与石头之间经营着日复一日的生计。安塞全区耕地中约百分之九十五属于山地，这里的日子从来都不轻松，但先民们仍然在沟壑间开垦出片片良田，沿溪筑坝，引水灌溉，将一方贫瘠的黄土地变成了可以世代生息的所在。

明清之际，李塔村逐渐形成今日的格局。村里的古井至今仍存，井壁青苔斑驳，井水清冽如初，仿佛还能照见当年担水人的身影。古树苍然，枝叶繁茂，见证了数百年的风霜雨雪。几处石碾盘散落在院落之间，表面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圆润，那是旧时村民们碾米磨面的日常工具，如今静静地躺在杂草丛中，无声诉说着曾经的烟火人间。

这便是李塔村的自然底色与古村风貌。它深藏在安塞的沟壑之间，葫芦形的山沟里藏着数百年的耕读传承，村前的古寨堡默然矗立，见证着这片土地从唐代吐谷浑游牧、宋夏铁骑交锋、明清村落肇建直至近代风云变幻的沧桑变迁。而这一切，不过是李塔村厚重历史的序章。

明代边墙下的“暗哨”

自北宋的烽烟散去，至清同治年间董福祥的乱局再起，其间横亘着漫长的明代。对陕北而言，这并非一段太平岁月，而是“边患”地理的北移与内化。明初，防线一度北推至河套，然“土木之变”后，蒙古诸部（史称“套虏”）长期驻牧河套，延绥镇（榆林）成为九边重镇。安塞虽在官方舆图中标为“腹里”，实则处于边墙内缘的剧烈震荡带上。李塔，这个杏子河支沟里的小村，在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其命运并非静止，而是被卷入了一场场由北向南席卷而来的风暴中。其中，有两次确凿的“扫境”之祸，足以让我们重构那段被遗忘的“避虏”记忆。

明代边防格局的演变，深刻影响了李塔村的地理处境。成化年间，巡抚余子俊大修边墙（明长城），其主防线位于安塞以北的靖边、吴起一线。李塔所在的杏子河流域（浑州川），虽不在长城正关，却是延安府北部的交通孔道。史载嘉靖年间，俺答部曾多次突破宁夏、保安等外线，深入延安、庆阳腹地掳掠。当烽火在北面的山梁燃起时，杏子川便成了官军调防的通道，也是游骑可能渗透的缝隙。李塔村作为招安镇的东大门，其山岭上的古寨，在此时极可能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不再是宋代的拒马前沿，而是明代监视腹地、预警避乱的“暗哨”。这种角色的转变，源于整个明代陕北防御体系的纵深化。

明廷在陕北的防御，并非固守一道边墙，而是构建“堡寨—边墙—烽燧”三位一体的纵

深体系。当边墙被突破，散布于山川要冲的各类寨堡，便成为迟滞、预警和收容的第二道防线。李塔寨的形制——石墙、险径、高台、古井——与明代官方倡导并民间广泛修筑的“崖寨”高度吻合。其选址之巧，既可利用天险，又能控制沟口，正是应对游骑流窜的典型设计。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在边情紧急的年份，地方保甲或乡绅极可能重新启用并加固了这座古寨，使其纳入地方自保的网络之中。寨中那口不知开凿于何时的深井，在此时的意义远超寻常水源，它是在围困中维系生命的战略储备。这种“因险设寨、凭寨自固”的逻辑，是明代陕北民众在官方力量不足时，被迫发展出的生存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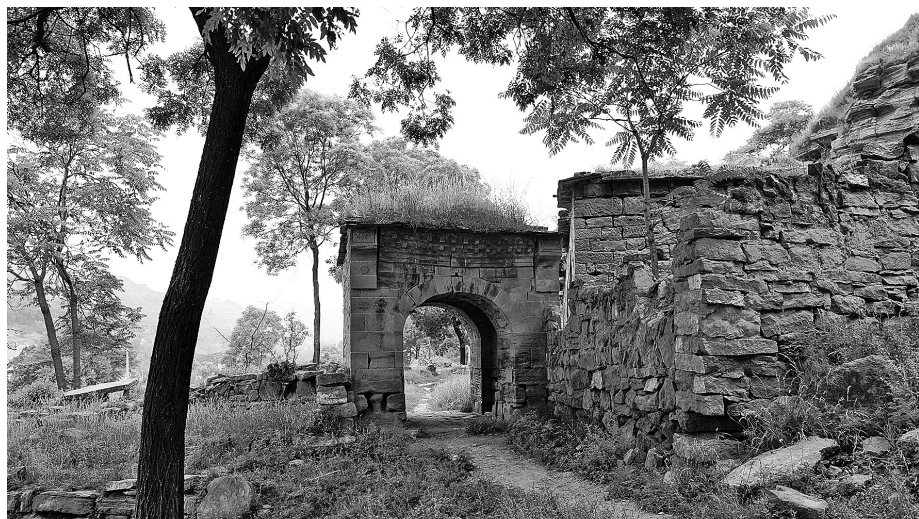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两次具体而惨烈的注脚，足以窥见当时李塔可能面临的威胁。第一次是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冬。据《明宪宗实录》记载，蒙古骑兵大举入寇延绥，“入延绥，保安、安塞二县分道剽掠，焚营堡，杀军民居民男女，钱谷牛羊扫境一空”。奏报中痛陈守军“俱闭门坐视”。这一年冬天的寒风里，“扫境一空”四字意味着安塞县境内几无完土。杏子川作为连接保安与安塞县城的天然走廊，正是“分道剽掠”的必经之路。可以想见，当烽燧传来“虏入安塞”的警讯，李塔村民必然如同他们的宋代先祖一样，弃家驱畜，携粮扶幼，沿着那条陡峭小径，全族退守山顶古寨。寨墙上的每一次修补，或许就始于这样的惊魂之年。这次危机，很可能催生了明代对李塔寨的首次大规模修复，将原本可能已残破的宋夏遗垒，重新夯筑为真正的“避虏所”。

更大的动荡发生在近八十年后的嘉靖年间。嘉靖二十四年（1545）七月，史载“套虏”两万余骑自宁夏塞破墙而入，守将张鹏不能御。虏骑“扬扬南驰”，经保安、安塞县，直抵园林驿、岔洛川，距延安府城仅百里，“盘留十余日而去”。此次入寇，官军多“逗留观望”，致使“蹂躏田稼、燔毁室庐不可数计”。招安镇所在的区域，正处在此次入寇的兵锋掠过之地。蒙古骑兵为了最大限度地劫掠人口与粮草，必然会沿河谷川道流窜扫荡。李塔沟口外的开阔地，极可能成为游骑饮马、劫掠零散村落的前沿。这种“近在咫尺”的威胁——马蹄声或许就在沟外响起，远处邻村的烟火清晰可见——比直接的攻击更能深入骨髓地塑造一种集体的恐惧记忆与避险本能。在嘉靖朝及其后边患频仍的岁月里，“入寨避虏”很可能已成为李塔及周边村落一种周期性的、近乎条件反射的生存仪式。

长期处于这种“背景性焦虑”之下，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生态与文化心理。明代中后期，陕北军屯败坏，民生异常艰难。李塔沟内那些布局规整、砌石精良的古窑院，或许正是这种复杂心态的折射。在长期与战乱、匮乏为邻的土地上，人们对“文教昌明”“世代太平”的渴望，对田园牧歌式安宁生活的向往，比任何富庶之地都更为炽烈而深沉。那石刻上的鹿与马，与其说是纯粹的装饰，不如说是一种在精神上对抗现实烽烟的祥瑞寄托。

因此，明代对于李塔而言，是一个“寨堡记忆”被不断激活和强化的时代。这段历史虽未像宋夏战争那样留下具体的攻防记载，也未像同治回乱那样涌现出标志性的枭雄人物，但它作为一种持续而沉重的生存背景，早已渗入这片土地的肌理。寨子，在明代不是史书中的主角，却始终成为李塔人应对无常世事的最后底牌。它像一块历史的磁石，吸附了从成化到嘉靖年间无数次惊悚的喘息、决断的汗水和劫后的余悸。它沉默地矗立在那里，连接着北宋的“防胡”与清代的“避匪”，构成了李塔村跨越近千年时光的生存逻辑中，那根坚韧而隐忍的脉络。直到新的时代浪潮涌来，这座古寨又将承载起全然不同的命运，而那，已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了。

（下转第七版）



● 石拱门守着村寨过往

于媛媛 摄



● 老石磨藏着旧时光

张明明 摄

刀兵，以及晚清董福祥的马队扬尘。

这篇文字，便从这座寨子说起，试着打捞那些沉在黄土深处的血色记忆与寨堡春秋。

山形地貌与古村遗存

李塔村位于安塞区招安镇东北约九公里处，南北走向的山沟长约十五华里，四面环山，民居村落依山傍水，一条小溪自沟内流出，蜿蜒汇入杏子河。从高处望去，整个村庄呈葫芦形状，沟壑环绕，北高南低，地形幽深。安塞全区属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境内沟壑纵横，梁峁遍布，平均海拔近一千四百米，而李塔村坐落在这样一片起伏跌宕的黄土褶皱之中，得溪水滋养，数百年来生生不息。

村子所在的这条沟，是杏子河流域众多支沟中的一条。杏子河古称浑州川，发源于靖边白于山，全长百余里，流经志丹县，从招安镇进入安塞，至沿河湾汇入延河。这条河谷虽然不大，却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军事角色——它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安塞，是连接陕北高原腹地与延安城的天然通道。北宋年间，这里是宋夏对峙的前线，狄青所筑的招安寨（今招安镇）即雄踞于浑州川（杏子河）之畔，控扼要冲，它与扼守延河河谷的龙安寨、屏卫西川的万安

的汉人聚落，但脚下的黄土层中，很可能叠压着唐至五代时期农牧文明交汇的深层历史记忆。

村中至今保存着多处古窑院落，格局层层分明。最显眼的三处大院，窑洞皆用石块砌成，纵横相交，院落宽大，兼有门楼，险畔以石板垒砌，部分呈拱形以夯实稳固。其中一个院子的石门楼两侧刻有一副对联：“荆树有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耕。”寥寥十四字，透露出旧时殷实人家对家族和睦与耕读传家的朴素期盼。院内门楼上的木石雕刻，有花有动物，还有刻着的字，纹样精美，工艺考究，每一处细节都藏着一户人家曾经的光景。

村中曾出土明朝天启四年（1624）的古墓石刻，刻有“奕世文明”四字，摩崖石刻上雕有卧鹿、卧龙、奔马等图案，形象生动，工艺精湛。李塔村的前身为“李家塌”——“塌”在陕北方言中指的是黄土高原上被水流冲刷形成的塌陷地带，这个地名比“李塔”更古老，也更贴近这片土地最初的样貌。

村前的李塔寨，地势极为险要，其历史渊源值得深入推究。据现存地形与宋代安塞边防体系分析，其最初的军事功能或可追溯至北宋。李塔村所在的葫芦形沟口，距浑州川主道上的招安寨直线距离不远，

导读

6版 延州阅读

■ 尘嚣中的坚守

■ 一本好书，一缕春风

7版 综合

■ 夏日的老井记忆

■ 山上有棵杜梨树

8版 杨家岭

■ 神秘的虎峪寺

■ 静享生活之美

策划统筹/忽弋琛

责任编辑/延 媛

视觉设计/马 荣

组 版/王 娟

校 对/高红英 白浩天

电 话：0911-8216611 8216232